

# 目 錄

序 言 i

## **第一章 播種與萌芽：聖保羅堂緣起 (1841－1910) . . . . . 1**

第一節 聖公會東來香港佈教 4

第二節 聖保羅堂建立經過 9

第三節 聖保羅堂的創辦人 14

## **第二章 初創與開發：早期聖保羅堂 (1911－1927) . . . . . 19**

第一節 鐵崗上的教會和學校 22

第二節 聖保羅堂教務的擴充 31

第三節 早期培養的牧者和信徒 37

## **第三章 成長和進展：牧區成立起步 (1928－1941) . . . . . 41**

第一節 牧區成立後堂務的進展 44

第二節 戰爭對堂務的影響 53

第三節 牧養信眾和培育聖品 61

<b>第四章 艱困與復興：烽煙時代事工（1942－1951）</b> . . . . .	<b>67</b>
第一節 香港淪陷時期的教會	70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聖保羅堂	76
第三節 聖保羅堂的「建設年」	80
<b>第五章 建設與擴展：整裝候命待發（1952－1971）</b> . . . . .	<b>91</b>
第一節 培養聖品及封立聖職	94
第二節 邁向五十周年的進展	100
第三節 人事變遷和堂務更新	105
<b>第六章 收成與鞏固：為信愛望奮戰（1972－1997）</b> . . . . .	<b>113</b>
第一節 新的開始和收成	116
第二節 中英談判與教會事工	122
第三節 香港回歸與教會靈命	130
<b>第七章 傳承與創新：配合教省發展（1998－現在）</b> . . . . .	<b>137</b>
第一節 香港聖公會教省成立	140
第二節 紮根基督迎世變	144
第三節 信徒和教會的更新	154
第四節 百周年堂慶活動	158

## **第八章 事奉與弘揚：聖保羅堂各部進展和宣道工作 . . . . . 163**

第一節 分部緣起和演變 166

第二節 服務部門的工作 169

第三節 培育及傳道部門的進展 187

## **第九章 感恩和盼望：繼往開來譜寫教會的新篇章 . . . . . 205**

第一節 百年堂史的時代分期 208

第二節 歷任聖品和宣教工作 212

第三節 教會使命和社會責任 217

附錄一 牧者傳略及聖品名錄 220

附錄二 顧問、值理 / 牧區議員名錄 230

附錄三 書記、機構代表及各部職員名錄 256

附錄四 大事年表及堂史紀錄 323

附錄五 名詞事項及機構說明 329

徵引文獻及主要參考書目 335

後記：聖保羅堂與我 339





## 第一章

# 播種與萌芽：聖保羅堂緣起 (1841－1910)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創辦人



林護先生



李維楨先生



黃茂林先生



史超域牧師



香港聖公會主教府（舊稱會督府）今貌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今貌

## 第一章

### 播種與萌芽：聖保羅堂緣起（1841－1910）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St. Paul's Church) 成立於1911年10月28日。在此之前，由始倡到建堂，前後經過兩年多時間，教會史上稱為「萌芽時期」。<sup>1</sup>當時英國聖公會在香港開展傳道工作，已有六十多年歷史，隨着香港社會的發展，居民日漸增加，1911年全港人口總數達四十五萬餘人，其中四十三萬以上是華人；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亟需一間華人教堂，新時代的起步正整裝待發，聖保羅堂就是在這個基根上建立起來的。

#### 第一節 聖公會東來香港佈教

##### ■ 聖公會成立和發展

聖公會又名安立甘教會 (Anglican Church)，原意是指英格蘭的教會 (Church of England)，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脫離天主教教宗的管轄而成為自主的教會，1534年英格蘭國會通過《最高權威法》(或譯《至尊法案》；*Supremacy Act*)，承認英國教會以英皇為最高元首，並定聖公會為國教。聖公會的最高宗教領袖是坎特伯利大主教

---

1 〈本堂三十年史略〉，《香港聖保羅堂三十週年紀念刊》(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1941年)，頁24；曹思晃〈本堂四十年史略〉，《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四十週年紀念刊》(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1951年)，頁17。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祈禱禮儀主要用具有信綱地位的《公禱書》<sup>2</sup>，信仰以《聖經》(包括《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為根據，承認《尼吉亞信經》和《使徒信經》。<sup>3</sup> 1558年英女皇伊利莎伯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年)登基後，在她長達四十五年的統治下，聖公會揉合新教精神和公教胸襟的傳統，逐漸得以鞏固和肯定。初期發展基本上以英格蘭國教為主，至1689年才在鄰邦成立蘇格蘭聖公會。

1776年，北美洲由英格蘭管轄的十三個州郡聯合發表獨立宣言，揭開美國獨立革命的序幕，英、美關係破裂，導致美國聖公會與英格蘭國教分離。1784年，首位美國本土主教獲蘇格蘭聖公會祝聖就職，開啟了美國聖公會獨立之門。為保持教內合一，英格蘭國會於1786年通過議案，允許各地的聖公會主教在英格蘭接受祝聖，翌年就有多位美國聖公會牧者獲坎特伯利大主教祝聖為主教。此後，類似的教區組織相繼在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大英帝國地區成立。

1835年開始出現海外的聖公宗教省組織，每個教省均涵蓋多個教區，完全獨立自主，不受坎特伯利宗座(See of Canterbury)轄制。這個體制很快普及起來，遍佈世界各地，為了維繫宗派內的團結，各地教省於是共同組織了普世聖公宗(亦稱普世聖公會；Anglican Communion)；1867年起，每隔十年左右便召開一次蘭伯會議(Lambeth Conference)，由聖公會主教參加討論教內要務。其後，於1969年建立普世聖公宗諮詢議會(Anglican Consultative Council)，由來自各聖公會和教省的神職人員代表、平信徒代表以及主教代表參加，為一諮詢組織。普世聖公宗主要為團契性質，成員間沒有具約束力的從屬關係，而是以互信形式商討事工，彼此共同合作。<sup>4</sup>

2 《公禱書》(*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最早的版本是英皇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1537－1553年)時由大主教克蘭瑪任主要編纂人，於1549年獲英國國會通過，成為英國教會唯一的公共崇拜禮儀用書，俗稱為《愛德華六世第一部公禱書》。三年後，《愛德華六世第一部公禱書》面世，並且亦獲英國國會通過接納，取代1549年《公禱書》，成為英國教會唯一的公共崇拜禮儀用書，其特色是大幅度刪去1549年《公禱書》中，被視為與聖經的教導不一致的禮文。1662年的版本是各國聖公會通用的標準本，現時不同國家和地區各種語文版本，除了一些細節是為了適應各地教會的實際情況而有所變更外，基本內容都以1662年的英文版為根據。

3 《尼吉亞信經》(或譯《尼西亞信經》；*The Nicene Creed*)是基督教古老信經之一，因公元325年在尼吉亞召開基督教第一次大公會議確定而得名。今本《尼吉亞信經》是五世紀時修訂後確立的，普遍用於東西教會的聖餐禮中。《使徒信經》(*The Apostles' Creed*)亦是基督教古老信經之一，反映了使徒的信仰和教訓。中文「聖公會」名稱的出處，就是本於《尼吉亞信經》中「我等信使徒所立獨一聖而公之教會」和《使徒信經》中「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4 吳國傑著《10大香港宗派巡禮：透視主要基督教宗派》(香港：基稻田出版社，2008年)，頁12－14；丁光訓、金魯賢主編《基督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普世聖公會〉條，頁475－476。

## ■ 早期來港的牧師和會督

英國聖公會在香港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當時中、英兩國爆發鴉片戰爭，英國海軍中有不少聖公會教徒，他們在香港島登陸後，自行組織臨時崇拜聚會。聖公會的腓力牧師，曾建立一間木造的聖堂。1842年，聖公會信徒在花園道口瑪麗操場建一棚廠，作為臨時禮拜之所。翌年，英國聖公會委派史丹頓牧師 (Rev. 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1891年) 來港，作為首任殖民地牧師 (Colonial Chaplain)，負責牧養英國僑居香港的各個行業人士。他在中環着手興建聖約翰座堂 (早期亦稱聖約翰大禮拜堂；St. John's Cathedral)<sup>5</sup>，1847年奠基，至1849年落成，是基督教新教在東方建立的早期教堂之一。該堂於牧養英國僑胞之餘，亦向華人傳揚福音。<sup>6</sup>

史丹頓牧師曾於1838年隻身到粵傳道，旋被地方官拘禁，閱四個月始獲審釋，1841年返英。1843年至1849年間，史丹頓牧師在港設堂立校，為聖公會東來佈教鋪路，創設華南教會的始基。在中華聖公會歷史上，他的先驅地位是得到肯定的：「以個人而言，應以英人史丹頓為吾會之開山祖；以差會及教會而言，應推美聖公會之文〔惠廉〕主教為創立教會之第一人。」<sup>7</sup> 文惠廉主教 (Bishop William Boone, 1811–1864年) 於1842年至廈門，1845年移上海，時已被祝聖為會督，奠定長江一帶教會的基礎。<sup>8</sup>

英國聖公會為擴展香港、中國內地及鄰近區域的事工，於1849年成立維多利亞教區 (Diocese of Victoria)，並於5月29日祝聖施美夫牧師 (或譯司茂、四美；Rev. George Smith, 1815–1871年) 為首任會督。<sup>9</sup> 「會督」是香港地區對主教 (Bishop) 的稱呼，

---

5 聖約翰座堂是香港最古老的基督教教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45年一次空襲中曾遭破壞，1947年完成修復工作，其後續有加建工程。建築物於1996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參閱Doreen King,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St. John's Cathedral, 1987)。

6 George B. Endacott and Dorothy E. She, *The Diocese of Victoria,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Church History 1849–1949* (Hong Kong: Standard Press, 1949), pp. 9-14.

7 《中華聖公會年鑑》(上海：中華聖公會總議會中央辦事處，1949年)，頁5。

8 〈認識我等教會〉，《公禱書》(香港：中華聖公會港澳教區，1938年初版，1959年重訂；香港：香港聖公會，1998年初版)，頁408。

9 施美夫會督是香港聖公會第一任主教，在任期間(1849–1866年)曾旅行九次，足跡遍及日本、印度、澳洲、美國及中國內地。1863年按立第一位中國人羅心源為會吏，1865年建立聖士提反堂。他在中國工作二十餘年，為發展教務作出了貢獻。參閱《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一三五週年慶典中央籌備委員會，1994年)。關於聖公會早期在香港的發展，可參劉紹麟著《香港華人教會之開基(1842–1866)》(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003年)，頁139–150。

一直使用到1980年代才正式改稱「主教」。英國聖公會開展在港華人工作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成立以訓練華人傳道為宗旨的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該校的創辦人是史丹頓牧師，早於1841年，他就在英國籌募創校經費，1849年開辦為教育中國人子弟英語的學校，史丹頓牧師為首任校長。至施美夫會督來港後，校舍才於1851年正式落成，校址毗鄰下亞厘畢道與雪廠街交界的會督府（現稱主教府；Bishop's House）<sup>10</sup>，校政由施美夫會督主理。

1861年12月，司徒靈芝牧師（Rev. Thomas Stringer）來港傳教，當時聖保羅書院已有相當成績，他曾於施美夫會督返英時兼理該校校務。1865年司徒靈芝轉到廣州的英國領事館任職，由華連（Charles F. Warren）接掌他在香港的工作，籌建聖公會第一間華人教會聖士提反堂（St. Stephen's Church）。<sup>11</sup> 1867年起，維多利亞教區由柯爾福會督（Bishop Charles Richard Alford，1816—1898年）主持會政。<sup>12</sup> 1874年，包爾騰會督（Bishop John Shaw Burdon，1826—1907年）就職<sup>13</sup>。他在港創立神道學校，培育神道學生，吳錦堂、鍾懷柔、羅儉行、霍靜山、莫壽增等，皆為當中的表表者；又於神道班之外，取錄未入教子弟，授以普通教育。1898年霍約瑟會督（Bishop Joseph Charles Hoare，1851—1906年）繼任<sup>14</sup>，恢復專辦神道班。

10 香港聖公會會督府於1848年建成，風格典雅，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殖民地建築之一。現時主教府下面向着下亞厘畢道的護土牆上，仍見刻有「聖保羅書院」及早年校訓「恭敬天主，愛人如己」字樣。

11 聖士提反堂成立於1865年，其初在中環荷李活道（早期譯作荷里活道）大笪地對面一地段，即今日聖馬太堂所在地址，而面積較大；後因政府開闢馬路，與聖士提反堂換地，1888年遷建於薄扶林道。

12 柯爾福會督是香港聖公會第二任主教，在任期間（1867—1873年）除會務外，兼理教育事業，並協助神學校訓練神學生。他常到華北及日本工作，曾於英國募款在中國開辦孤兒院。1871年為海員建立聖彼得堂。參閱《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13 包爾騰會督是香港聖公會第三任主教，在任期間（1874—1897年）於內地建立教會學校，在香港創立神道學校，又從事編譯《公禱書》和《聖經》為廣東話，教育工作由香港島伸展到九龍半島。參閱《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14 霍約瑟會督是香港聖公會第四任主教，在任期間（1898—1906年）擴充聖保羅書院，專門訓練神道學生，教務發展迅速。為培植華人教會起見，於1902年組織香港教區議會，經政府立案為法權人。1906年9月18日乘船前往新界青山佈道，在途中遇颶風，船隻被打沉，霍約瑟會督與四名神道學生因而殉難。參閱《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1956年9月，青山聖彼得堂為紀念霍約瑟會督遇難五十周年，特建新堂一所以為紀念，聖保羅堂教友亦有參加此次崇拜。

1907年，倫義華會督（Bishop Gerard Heath Lander，1861—1934年）來港就任<sup>15</sup>；他於次年組織成立香港總議會（後來改稱香港牧區聯議會），是香港華人各堂聯會自治之始。1909年，倫義華會督邀請英國聖公會海外傳道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通稱「差會」接辦聖保羅書院，回復為英文學校，由史超域牧師（或譯史釗域牧師；Rev. Arthur Dudley Stewart，？—1953年）接任校長。在此之前，聖保羅書院培訓了一些牧者如鄺日修（1840—1921年）<sup>16</sup>；也出過不少優秀的畢業生，例如大名鼎鼎的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年）。<sup>17</sup>該校後來設有伍廷芳堂（Wu Ting Fang Hall），1950年改建為聖保羅堂副堂。

伍廷芳，字文爵，號秩庸，原籍廣東新會，生於新加坡。曾就讀於香港的聖保羅書院、中央書院，後赴英國留學。畢業於林肯法律學院，獲大律師資格；返港任律師，旋任香港政府法官兼立法局議員，是香港第一位華人太平紳士、第一位華人立法局議員，1882年受李鴻章聘請，北上協辦洋務與外交。歷任清政府駐美國、日本、秘魯、墨西哥、古巴等國公使，1909年回國。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伍廷芳宣佈贊成共和，任南京臨時政府議和總代表、司法總長，其後極力反對袁世凱稱帝。1916年黎元洪任大總統，伍廷芳出任外交總長及代國務總理。次年，反對段祺瑞解散國會，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任護法軍政府外交總長等職。

---

15 倫義華會督是香港聖公會第五任主教，在任期間（1907—1920年）首先加強聖約翰座堂的組織，委派座堂牧師團協助座堂主任牧師工作；1911年成立聖馬利亞堂。1912年中華聖公會成立後，倫會督曾前往雲南、廣西兩省視察及指示教會事工。參閱《聖公會港澳教區一百三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16 鄺日修，廣東台山人，幼年在鄉間讀書，十八歲後赴澳洲謀生。1885年回到香港，入聖保羅神學院研讀神學，後任倫敦會傳道七年，因聖士提反堂羅心源會吏退休，遂繼其職。1893年按立為會吏，翌年晉升為牧師。1902年派為九龍半島牧師，先後建立維多利亞小學校、聖三一堂、廣蔭院、聖保羅小學校等。參閱鍾仁立〈鄺日修牧師傳略〉，劉瑞滔編《港粵澳名牧生平》第一集（香港：中華基督教會，1975年），頁7—10。

17 張禮恆著《伍廷芳的外交生涯》（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年），頁248—253。關於伍廷芳的生平事蹟，還可參閱Linda Pomerantz—Zhang, *Wu Tingfang (1844—1922): Reformer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 第二節 聖保羅堂建立經過

### ■ 堂史上的萌芽時期

1909年7月15日下午五時半，在中環雲咸街基督教青年會內<sup>18</sup>，有三個華人於會議室中喁喁私語，似有重要事情商量；半小時後，又有一個英國人加入討論，言談中各人都表現得情緒緊張，而又異常興奮。這三個華人就是林護、黃茂林和李維楨，他們都是活躍於社會上的基督教徒，林護是建築商，黃茂林和李維楨是會計師，當時大家正值三十多歲青壯之年。那位英國人就是史超域牧師，1905年來港，通曉粵語，剛接任聖保羅書院校長不久。原來他們在議論如何組織堂會，並且希望能在中環區內設立一個禮拜堂，由於華人信徒日漸增加，區內的崇拜聚會以英語為主，實在很需要一間華語教堂，為華人信眾提供服務。這次會議，即為聖公會聖保羅堂「胚胎之開端」。<sup>19</sup>

一個月後，他們借了會督府的小禮拜堂，作為教堂主日崇拜的地方；同時稟呈總議會，臨時委派一位牧師處理堂務，並請得羅德福為琴師。三個月後，聚集人數漸增，於是開始編輯教友名冊，請吳錦堂兼任傳道，霍靜山牧師為系統上牧師，史超域牧師為工作上牧師。霍靜山牧師是聖士提反堂主任牧師，兼任牧區聯議會副主席；又開設奮興會<sup>20</sup>，以為信徒作證救人之會所。他曾兼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教務，及教會聖品人典試委員等職，桃李盈庭，吳錦堂是他早年教過的學生之一。

十個月後，教友人數大增，舉行聚會時，遲到者要在戶外崇拜；因此向倫義華會

18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 成立於1901年，通稱「男青年會」，由有「革命富人」之稱的李紀堂 (1873－1943年) 捐資一千元開辦，因而會中骨幹人物黃茂林、林護等與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運動有較密切關係。該會於1902年分為英文部和中文部，以管理各項程序。至1908年，「西人部」及「華人部」成為兩個獨立部門，「西人部」的總部在亞歷山大廈，「華人部」的總部在雲咸街。1910年，「華人部」由黃茂林出任會長，當時已有會友逾千人；翌年，「華人部」正名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參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編《世界基督教青年會150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運動發展》(香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993年)，頁4－6。

19 〈本堂三十年史略〉，《香港聖保羅堂三十週年紀念刊》(1941年)，頁24。

20 奮興會成立於1907年，楊少泉在〈奮興報的十週回顧〉一文中說：「這個奮興會起首是香港安立甘教會的教友所組織的。他的宗旨是奮興信徒的靈性，興起服務的熱心。其中的設施多採取青年會的法子，但注重德育一門。他的性質好像聖公會內的勸勵會，每年的會長都從聖公會的聖士提反堂和聖保羅堂輪值委派。後來因各會的教友入會日漸加多，就把狹隘的範圍擴廣，會長每年由會友選舉，不論屬哪個公會的教友都可以選舉充任。」見《奮興會月報十週紀念號》，頁52。

督建議，將聖堂隔牆拆毀，以便加多座位，但不蒙允許。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籌建聖堂，當時聖保羅書院亦有擴充校舍計劃，於是雙方合作，興建一座共用的建築物，上層是聖保羅堂，下層作為學校課室。1910年8月，伍廷芳致函聖公會會督，捐款五千元，作為擴建母校聖保羅書院之用。

聖保羅堂於1911年3月11日舉行奠基典禮，主禮者包括港督盧押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1858—1945年)、倫義華會督、史超域牧師、左臣牧師、霍靜山牧師、山牧師 (Rev. Charles Brodie Shann, 1884—?年) 和拜也 (Alfred Bryer, 1873—1932年) 畫則師。同年10月28日，新堂落成啟用，主持揭幕典禮的人士有盧押爵士和他的夫人，倫義華會督、史超域牧師、林護和立法局議員何啟 (1859—1914年)。<sup>21</sup> 新堂是一座宏大的白色建築，外貌典雅而莊嚴，堂頂有十字架高聳，幾番擴建仍基本上維持原貌。鐵崗的斜坡依樣的高，只是兩旁青蒼的榕樹漸漸消失了，不再有樹木參天，而是車水馬龍的街道了。1980年代中，教友陸景好撰文見證了聖保羅堂環境的變遷。她說：

巍峨山嶺，鐵崗居中，迄立着一座宏大的建築物，……這是聖保羅堂，是主的教會，是神的家，我們屬靈的居所。……她曾幾經滄桑，依然堅立不動。她是建在磐石之上，狂風暴雨，亦不會動搖！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她曾造就了多少賢達、牧者，和社會傑出的青年。……六十多年前的往事，重現目前，鐵崗的斜坡依樣的高，兩旁的榕樹青蒼，像慈母的雙手，護衛小羊。……從前步入聖堂，必須經一條小徑，我愛站在路旁的小丘上，數着慢步的會友，每次有婚禮，都去看新娘子，多少名流的進出，有穿婚紗的，有戴鳳冠霞珮的，……感謝保羅堂的帶領，栽培，我也漸漸成長了。<sup>22</sup>

---

21 何啟是醫生、大律師、商人，在當時為香港華人領袖，創辦雅麗氏醫院，附設香港西醫書院，曾任立法局議員十餘年。他致力於推廣醫學及教育，並常在報章上發表有關中國改革的言論。1912年被冊封為爵士，成為香港首位封爵的華人。其父何福堂 (1817—1871年) 是香港最早的華人牧師。

22 陸景好〈聖保羅堂與我〉，《聖保羅堂七十五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1986年)，頁74。

2011年，聖保羅堂建成一百年後，該堂的牧區主任林壽楓法政牧師為文指出：

當我們把焦點放在教堂這座建築物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座教堂是為人而建造的；在這裏，信徒崇拜上帝，領受聖事的恩典和牧養，得到培育，並且與其他的信徒群策群力，組織團契，推廣傳揚福音的事工。這些活動不分軒輊，都是同樣重要，在教會的整體生活中，缺一不可，由不同的部或團契肩負和推動。這些都可以說是「樹人」的工作，因為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使徒聖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所說的：「……到我們眾人在信仰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達到基督完全長成的身量」。<sup>23</sup>

## ■ 大時代的華人教堂

聖保羅堂啟用後，常與聖士提反堂合作，例如兩堂合刊《徵信錄》；若除夕聚集在聖保羅堂舉行，則新年聚集須在聖士提反堂舉行，因此當時有東西兩堂之稱。聖士提反堂於1888年由中環荷李活道遷建於薄扶林道，距離中環華人社區較遠。<sup>24</sup>新建的聖保羅堂，正好為中區教友提供了聚會崇拜的地點。聖保羅堂成立時，聖公會在香港島有聖士提反堂牧區，在九龍有三一牧區和諸聖堂牧區，聖保羅堂為華人教會增添了力量，隨着新時代的發展和需要，香港島增設牧區的建議也就提上日程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聖保羅堂成立時，香港聖公會正處於一個關鍵性的轉變時刻，在擴大開拓中國內地宣道事業和集中發展香港本地傳教工作兩者之間徘徊；英國聖公會在宣教策略上是傾向於前者的，不過亦要兼顧香港華人社會迅速興起這一趨勢。而在中國內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各省響應，紛紛宣告獨立，史稱辛亥革命。次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旋即宣告結束。自晚清以來，英、美、加、澳等國的聖公會差會，分別在中國境內成立了多個教區和傳道地

23 林壽楓〈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聖公會聖保羅堂主日學部特刊2011》（香港：聖保羅堂，2011年），頁2。

24 現時的聖士提反堂是1965年6月5日建成的，由何明華會督主持慶典。舊堂因殘破且不敷使用，因而於1959年發動全堂教友大募捐。聖士提反堂百多年來，在牧區聖品鄭日修牧師、霍靜山牧師、李求恩會吏長、鍾仁立會吏長及張榮岳副主教的主持下，堂務穩步發展，除了早期的鄭日修牧師，其餘多位聖品均與聖保羅堂有頗密切的關係。

區，為了統一聖公會的傳教工作，1912年4月26日組成中華聖公會（Chung Hua Sheng Kung Hui, Chinese Anglican Church），設總議會於上海，其組織分為主教院與代表院，規定三年一敘；總議會閉會後，由總議會常務委員會執行工作。全國劃分為十一個教區<sup>25</sup>，港粵教區（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是其中之一，於1913年成立，後來亦稱華南教區，包括香港、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

中華聖公會「乃繼承耶穌基督所創立之普世聖而公之教會，專以宣傳福音為宗旨。」其名稱之意義如下：

「中華」乃中國人自立、自養、自治、自傳之意；「聖」乃指脫離惡俗；「公」無分階級種族，富貴貧賤，天下一家；「會」乃指同蒙神召，同作神工，為靈性之團契。<sup>26</sup>

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成立後，香港的聖公會華語教堂，包括聖保羅堂在內，自此都成為港粵教區的一份子。（表1）即是說，聖保羅堂在1911年成立時仍屬於維多利亞教區，1913年起隸屬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不過維多利亞教區主教同時亦是港粵教區主教。倫義華會督身兼兩職，在同一主教轄下的教區有兩個最高立法機關：一個是香港的英國聖公會維多利亞教區議會，包括直接由英國管理的香港西人教會在內；另一個是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議會，直接隸屬於中華聖公會總議會。這情狀維持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因中國政局改變，1951年聖公會港澳教區（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cao）成立，傳道工作集中於香港、澳門兩地。<sup>27</sup> 1956年5月，中華聖公会在上海聖三一堂召開主教院暨常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是最後一屆總議會會議。1958年後，中華聖公會總議會停止活動，中國內地的聖公會信徒參加聯合禮拜。<sup>28</sup> 1960年

---

25 中華聖公會成立時的十一個教區是：江蘇教區、港粵教區、浙江教區、華北教區、華西教區、鄂湘教區、山東教區、福建教區、桂湘教區、河南教區和皖贛教區；1936年分華西教區為東川教區和西川教區，1947年復成立雲貴教區。

26 〈認識我等教會〉，《公禱書》，頁405。

27 陳謳明〈香港聖公會歷史與體制之演進〉，《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九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2002年），頁5-6。

28 丁光訓、金魯賢主編《基督教大辭典》，〈中國聖公會〉條，頁830；〈中華聖公會總議會〉條，頁840。